



卫礼贤与汉学

首届青岛德华论坛文集

余明锋 张振华 编

孙周兴 冯俊 主编
欧洲文化丛书

1907
The Commercia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卫礼贤与汉学

首届青岛德华论坛文集

余明锋
张振华 编

孙周兴 冯俊 主编

欧洲文化丛书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卫礼贤与汉学：首届青岛德华论坛文集 / 余明锋，
张振华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欧洲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5280 - 8

I. ①卫… II. ①余… ②张… III. ①汉学 — 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20022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欧洲文化丛书

卫礼贤与汉学

首届青岛德华论坛文集

余明锋 张振华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280 - 8

2017年9月第1版 开本 890×1240 1/32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6.625

定价：32.00元

主 编：孙周兴 冯 俊

主编助理：张振华 余明锋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雪梅 叶 隽 刘日明 孙周兴 孙宜学 汪民安

杨熙楠 吴建广 陆兴华 陈家琪 林子淳 郑春荣

赵 劲 赵千凡 赵旭东 胡春春 柯小刚 徐卫翔

梁家荣 韩 潮 谢志斌 辜学武

学术支持：

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

本书出版由 青岛德华文化研究中心（ZCDK） 资助
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

总 序

欧洲曾经是一个整体单位。中古基督教的欧洲原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即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前后，欧洲分出众多以民族语言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也有早有晚（德国算是其中的一个特别迟发的国家了），风风雨雨几个世纪间，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过程。而到20世纪的后半叶，欧洲重新开始了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进程，1993年11月1日，“欧盟”正式成立。至少在名义上，又一个统一的欧洲诞生了——是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么？

马克思当年曾预判：要搞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至少得整个欧洲一起搞——可惜后来的革命实践走了样。一个统一的欧洲显然也是哲人马克思的理想。而今天的欧盟似乎正在一步步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虽然欧盟起步不久，内部存在种种差异、矛盾和问题，甚至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但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欧洲，一个重视民生福利的欧洲，一个趋向稳重节制姿态的欧洲，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的。

马克思之后，欧洲文化进入到一个全面自我反省的阶段。哲人尼采发起的现代性文化批判尤其振聋发聩。而20世纪上半叶相继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彻底粉碎了近代以来欧洲知识人的启蒙理性美梦和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从此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另一方面，我

们也不得不看到，欧洲的哲学—科学—技术—工业—商业体系，至今仍旧是在全球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形态、文化形式、制度设计、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是说，今天世界现实的主体和主线依然是欧洲—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的任务仍然是未完成的，而且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

欧洲已经是“世界历史性的”欧洲。有鉴于此，我们当年创办了“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也正因此，我们今天要继续编辑出版“欧洲文化丛书”，愿以同舟共济的精神，推进我国的欧洲文化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17年8月25日改写于海口

目 录

圣犬

——卫礼贤与德语现代文学刍议……顾彬著 余明锋译 / 3

冯晓虎评论 / 13

卫礼贤的占卦实践……费乐仁著 张振华译 / 21

司马涛评论 / 32

贤哲别东西，思澄终归一

——作为卫礼贤、辜鸿铭

交谊纽带的孔子与歌德……叶 隽 / 37

辜学武评论 / 80

卫礼贤的柏拉图批判

——“致中和”作为世界治理策略……范 劲 / 89

孙周兴评论 / 114

卫礼贤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司马涛著 叶瑶译 / 125

论赫尔曼·凯泽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一书中的

中国印象……何心鹏著 高琳琳译 / 183

编后记 / 200

圣犬

——卫礼贤与德语现代文学刍议

／ 圣 犬 ／

——卫礼贤与德语现代文学刍议¹

顾彬（Wolfgang Kubin）著

余明锋译

当我1996年愉快地接受主人²之邀，去参加定于1997年4月在特里尔（Trier）为他举办的“中西对话”会议，并就“唯有中国人理解中国”³发表演讲，我并未意识到，我的生活和思想会由于先前的准备而发生一次转折。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广泛关注德语文学当中的中国形象，然而我的各种研究在理论上只停留于域外文化研究

1 原文并非 *die moderne deutsche Literatur*，而是 *die deutsche Moderne*。根据正文，应理解为最广义上的现代德语文学，即包括了现代德语世界的哲学、心理学和狭义上的文学，等等。本文的“现代”概念则主要指20世纪，特别是卫礼贤对德语知识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的20世纪上半叶。——译注

2 指下文提到的卜松山（Karl-Heinz Pohl）。——译注

3 《“唯有中国人理解中国”——东西方理解问题》，载卜松山编：《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思想——中西哲学路径之间的一场对话》，*Sinica Leidensia* 45，莱登：布列尔等，1999年，第47—57页。

(Exotismusforschung) 的水平。而现在所关系到的则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欧洲与中国的理解可能性，并且关系到一种哲学的端倪，这种哲学端倪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解释学名义下，作为一个学科在精神科学中逐渐赢得空间。自那以后，理解于我而言变得重要了，这种理解在根本上无法预先被设置，而是必须考虑到，在东西方的相遇中，这种理解的可能和不可能，甚而这种理解的被损害。



我不如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在我们这里，书籍仍然总是惯于带有一种自身无法兑现的普适要求。比如，苏黎世的英国语言文学家布朗芬 (Elisabeth Bronfen) 用她的研究《比白日思地更为深邃》¹ 如其副标题所说承诺了一种“黑夜文化史”。可我们读到的，只与西方有关。欧洲以外的各种文化在她的考察中不占有任何位置。普适主义的理论与特殊化实践之间的这样一种公然矛盾，在当今的汉语学界是无法想象的：在汉语学界，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在“文化史”这个词前面加上“中国”或“西方”之类字眼。

对理解的思考于我而言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也因为这使我得以把极端女权主义和反抗性的后殖民主义相对化。这两个阵营过去都常常持

1 这本发源于慕尼黑瀚瑟 (Hanser) 出版社的著作其实完全有可能将目光投向邻邦。因为，在她于波恩大学举办的一场讲座之后，我曾将自己就“黑夜在中国”这一主题所做研究之一赠送给她。

有这种观点：只有女性可以理解女性，欧洲对一切陌生事物的理解都无法脱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每一种对他者的理解因此就自动地接近于专制和压迫。这两种学说都与一种理论相关，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国当代哲学，因而多流于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卜松山因此常常将之戏讽为“速溶文论”¹，此言不谬。

我今天在此重又就中国形象做一个简短的论述，并不是重蹈覆辙，而是要尝试为一个长久以来、太久以来充当（德国）汉学替罪羊的人争取公道。此人正是伟大的中国经典翻译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一位心怀开明的救世倾向（Hang zur Weltverbesserung），并为此而操劳的汉学家。他对欧洲和中国的看法尽管带有倾向性，尽管如今会让许多人感到陌生，可我认为，只有不作为的人才不会授人以柄。某些汉学家之所以如今不会被人批判，是因为他既不站在中国一边，也不站在德国一边，他误以为存在着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无须介入争论，可以在任何时代公正地对待中国和德国。然而，前面提到的那位特里尔会议主人的著作，如《中国入门》²，却证明了解释学的根本所在：所有的理解都依赖历史，无论这历史是否为我们所支配。因此，我们要让自己进入历史，而这种“进入”总是一种可能陷入迷途的介入。无论如何，个体的“认信”（Bekentnis）才让科学富有生机。卫礼贤是如此，卜松山也是如此。他们都努力将中国和德国带入一场决非单

1 卜松山：《论（中西）跨文化语境中对于各种理论的讨论——或：元理论方向上的一次门外尝试》，《柏林中国期刊》2002/23，第41—53页。

2 卜松山：《中国入门》（*China für Anfänger*），弗赖堡：赫尔德，2008年。

纯互相指责的彼此对话。

因此，我想重新考察卫礼贤，考察这位介入式汉学的祖先。为此有必要先回到域外文化（Exotismus）这一主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会他对 20 世纪德国精神的巨大影响。

二

我们常常以所谓的词句吻合或不吻合为标准，而极少以译者的翻译对其读者所发生的影响为标准，来评判翻译家们。如果没有卫礼贤，现代德语哲学、心理学和文学的一大部分都是难以想象的，迄今为止这都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比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即便在遣词造句上，都多受卫礼贤《庄子》翻译（1912 年）的启发。¹荣格（C. G. Jung, 1875—1961）同样如此，他的原始类型学说受益于道家秘传和《易经》。²再比如，文学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在 1920 年的《道德经》阅读给他带来巨大的美学和世界观震撼，可谓其生命与创作的一个影响终身的转折点。³哥廷根日耳曼学家狄特林（Heinrich Detering, 1959— ）甚至认为，德波林（Alfred Döblin,

1 赖因哈特·迈伊（Reinhard May）：《源于东方的光——东方影响之下的海德格尔著作》，斯图加特：斯坦纳，1989 年，第 15—16、46、57—58、71—72 页。

2 荣格：《原始类型与集体无意识》（*Die Archetypen und das kollektive Unbewußte*），《文集》，杜塞尔多夫：瓦尔特，2006 年，第九卷上，卫礼贤的名字和著作大量出现在索引和参考文献中。

3 亨利希·狄特林（Heinrich Detering）：《布莱希特与老子》，哥廷根：华尔斯坦，2008 年。

1878—1957) 在读了卫礼贤版的《列子》(1912年)之后才开始立即着手为德语世界创作现代大都市小说。¹

简言之,没有卫礼贤,现代德语文学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一切现代都是被翻译的现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那么情形就更是如此了。也就是说,陌生国度和陌生文化的作品,一旦被翻译,就立即影响了本国事务的政治和文化进程。就此可以举出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可我不想陷入单纯的列举,并轻易偏离问题,即转而去讨论,20世纪有哪位汉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发生了一种类似的影响。这个问题且留待他处。²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举出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作为代表,没有终生对卫礼贤译本的阅读,他就不可能写出代表作《眩目》(*Die Blendung*, 1935年)和《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 1960年)。³

三

所以,我在此只想简要地举一个例子,聚焦在一个人身上,此人只有极少数人还有所耳闻。尽管他的小说《狂人鲍贝格》(*Der Tolle*

1 亨利希·狄特林:《布莱希特与老子》,哥廷根:华尔斯坦,2008年,第45—52页。

2 具体而言,是留待波恩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合作框架。我们已经与费乐仁(Lauren Pfister)一道制订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卫礼贤研究计划,其中也涉及他对现代德意志精神的影响。

3 武宁(Ning Wu):《卡内蒂与中国——源流,素材,陈述和解释》(*Canetti und China. Quellen, Materialien, Darstellung und Interpretation*),斯图加特:学院出版社,2000年。

Bomberg, 1923年)¹曾两度被搬上银幕(1932年, 1957年), 自1923年来发行了50版, 在世时获得巨大成功, 可他的作者温克勒(*Josef Winckler*)如今除了在威斯特法伦(*Westfahlen*), 几乎完全被遗忘。所以毫不奇怪的是, 他那本遗著, 以“中国圣犬”(1968年)为题的包含了38篇短篇小说的小说集²(只编辑了一半!)好像尚未引起任何注意。可即便汉学家也有必要重新发掘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 因为温克勒对中国的研究不仅深受卫礼贤的影响, 而且他对“中央帝国”最初的兴趣当得益于他的同学和朋友, 中国伟大戏剧的译者, 洪德豪森(*Hundhausen*, 1878—1955)³。如作者在言辞有力的前言中所交代的那样, 温克勒和洪德豪森曾一同在莱茵河下游的肯佩(*Kempen am Niederrhein*)求学, 就读于托毛尔姆文科中学(*Gymnasium Thomäum*, 温克勒于1894至1899年就读于此), 此后失去了联系, 并且再未谋面。可尽管如此, 这位约长三岁的朋友却曾邀请温克勒来中国, 因为自1924年开始他以律师的身份长居北京。邀请之语甚为风趣, 影射着温克勒的牙医本行:

-
- 1 约瑟夫·温克勒:《狂人鲍贝格——一篇威斯特法伦风格的流浪汉小说》, 埃姆斯戴腾:雷希特, 1986年,《文集》第二卷。
 - 2 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公司, 1968年。由汉斯·马丁·艾尔斯特(*Hanns Martin Elster*)从遗稿中编辑出版, 并写有后记。来自莱茵-本特拉格(*Rhein-Bentlage*)的芭芭拉·布朗-舒尔特-维辛(*Barbara Brunn-Schulte-Wissing*)不断地提醒我注意这本书。她甚至还把莱茵城市图书馆作废书处理的一个版本交给了我。顺便说一句, 作者的出生处就在本特拉格的萨里那(*Saline*), 还有纪念碑立在那里。
 - 3 有关洪德豪森的生平和著作, 请参见哈特穆特·瓦尔拉芬(*Hartmut Walraven*),《文森·洪德豪森(1878—1955):生平和著作》, 东方学文献与档案6, 威斯巴登:哈拉索威茨, 1999年。

快随我来，做我的宫廷医生！你将得到一座自己的宫殿，妻妾随便挑，你可以完全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医务附带做做……¹

尽管不知是何缘故，温克勒并未接受这份邀请，可就作者终生对中国的研究以及前面提到的故事集的灵感来源而言，洪德豪森仍然是其两位精神上的父亲之一。另一位则是卫礼贤。

在温克勒和卫礼贤之间甚至还有第三条连接彼此的线索。我们的这位威斯特法伦本地作家，“安内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1797—1848）之后，威斯特法伦文学最重要的代表”²，在欧根·迪德里希（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编辑他的刊物《新地》，作为新地-基金会（1912年）的喉舌，而欧根·迪德里希正是卫礼贤的主要出版商。³顺便说说，这个新地-基金会的主人是曾旅行中国的阿尔方斯·帕奎特（Alfons Paquet, 1881—1944）。

这与圣犬又有何关系呢？温克勒自1951年起，直至去世，都养有狮子狗（Pekinese），并于1953年开始在本斯贝格-弗兰肯福斯特（Bensberg-Frankenforst）开始动笔创作他的犬类故事。狮子狗本是宫苑宠物，专属中国的皇室，在帝国主义于1860至1900年间掳掠京城之后，来到了欧洲，在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驯化。温克勒并不是第一位将这个

1 温克勒：《中国圣犬》，第7页。

2 这是维基百科上有关我们这位作家的一条出色评论当中的话：de.wikipedia.org/wiki/Josef_Winckler（2008年12月6日）。

3 海德勒（Irmgard Heidler）：《出版商欧根·迪德里希及其世界》，美国汉出版学研究8，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98年，第584—597页。